

中国 历代名臣

主编 李桂海



御 歷代名臣



中国历代名臣

(下)

李桂海 主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1 号

中国历代名臣

李桂海 主编

责任编辑 张继红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4.125 印张 783 千字

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7 次印刷

印数 70,070—90,150 册

ISBN7-215-00021-4/K·5

定 价 (上下) 17.95 元

目 录

(下 册)

政治家、思想家和历史学家

司马光 顾全芳(1)

北宋奸威并施的权臣

蔡 京 任一鸣(15)

遗臭万年的奸相

秦 桧 任一鸣(27)

擅权误国的奸臣

贾似道 俞兆鹏(42)

受命于危难之际的

陆秀夫 田居俭(57)

留取丹心照汗青的

文天祥 陈清泉(68)

元代著名的政治家

耶律楚材 杨国宜(91)

元世祖的股肱重臣

刘秉忠 伍新福(115)

为官清廉的元代农学家

王 禕 邱树森(124)

辅佐元世祖统一全国的

张弘范 师道刚(135)

既是文臣又是水利专家的

贾 鲁 邱树森(152)

明代开国丞相

李善长 许 敏(163)

韬略似孔明的

刘 基 许 敏(175)

“自分一腔热血少，尽将赤族

报君王”的

方孝孺 张海鹏 王世华(189)

七下西洋的三保太监

- 郑和…………… 陈君聪(209)
- 贪鄙奸横的权臣
- 严嵩…………… 张正明(229)
- 一生为官清廉的
- 海瑞…………… 苏双碧(241)
- 明代杰出的改革家
- 张居正…………… 张海瀛(257)
- 明代阉党逆案之首
- 魏忠贤…………… 张海瀛(280)
- 与城共存亡的抗清名臣
- 史可法…………… 童恩翼(291)
- 力助清朝统一全国的摄政王
- 多尔袞…………… 豫宛(313)
- 清初杰出的辅政大臣
- 范文程…………… 杨庆镇(340)
- 专权跋扈的辅政大臣
- 鳌拜…………… 姜相顺(360)
- 得宠而又失宠的清初重臣
- 明珠…………… 杨国勇(382)
- 贪得无厌的大学士
- 和珅…………… 杨国勇(392)
- 坚决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
- 林则徐…………… 陈君聪(404)
- “誉之则为圣相，谥之则为元

凶”的

曾国藩…………… 赵明海(428)

历任清末三朝重臣的

奕 訢…………… 陈嘉炎(448)

洋务派的头子

李鸿章…………… 邢克斌(472)

毁誉参半的顾命大臣

张之洞…………… 赵明海(495)



政治家、思想家和历史学家

司马光

顾全芳

在山西省夏县西北，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落，这就是司马光的故乡。在宋代，夏县不属河东路即现在的山西省，而属陕西管辖。所以当时司马光和其他人，都称司马光为陕西陕州（今夏县）人。

司马光的籍贯是山西夏县，但他却不是诞生在夏县。而是生在光州（今河南光山县）。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司马池，在考中进士之后，便在光州等地作官。司马光在北宋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十月十八日，出生于光州，所以单名“光”。后来，司马光又称“司马君实”，那是因为他一生忠诚老实，不作口是心非的事。又叫“涑水先生”，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叫涑川。不过，他自己则喜欢叫“迂叟”，意思是他老实忠诚到近乎“迂”的地步。

学习刻苦和为官廉直

幼年时代的司马光，随着父亲的到处作官而奔波南北，他到过浙江杭州，安徽寿县，四川广元等许多地方。这些南国风光，给他以美好的印象。成年之后，司马光还经常回忆幼年时代的南国春秋，留恋那里的风土人情。

司马光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他父亲曾是四品官，担任过北宋中央政权中的天章阁待制等要务，但并不是权臣贵戚，更不是奸邪之徒。而且，司马光的先辈，是普通农民。司马光曾经说过，他的祖辈在埋葬时，连棺材都置不起。这种家风，给司马光以很大影

响。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，以清贫而不贪不奢为荣，并且希望这种家风，能传至后代。他在给他唯一的儿子司马康的训示中，就曾严格要求儿子俭朴，要求儿子不作亏心事。

事实上，司马光的父亲，也是这样要求司马光的。年幼的司马光不会剥核桃，别人问他核桃是否是自己剥的，他说是。正好叫司马池听见了。大骂儿子说谎。这件事对司马光教育很大。从此，司马光立志不说谎话，并且说到做到，终生不说假话，被人传为佳话和效法的榜样。不过，父亲要求司马光的主要方面，还在于读书求知。六岁开始，司马光便在父亲指点下，熟读文史。司马光不是神童，也不是天才。他缺乏王安石那种过目不忘的聪敏和才气。他的学识渊博，来自惊人的刻苦精神。他睡觉用的枕头，是一段圆木，叫“警枕”。圆木容易动，使人睡不稳。只要圆木一动而司马光惊醒，就立即起床挑灯夜读。正是这种精神，使司马光从小就博览群书，学力超群，而且功夫扎实，甚至不惜死记硬背。这就为他后来的治学和参政，打下了厚实的基础。

司马光十五岁就被录取为官。不过这是根据北宋规定，由于司马池是四品官，所以可以录用自己的儿子。这种“恩荫”即赐官，当然只能是一些待遇，而不是真的可以从此青云直上。司马光不想靠父亲的官位来庇护和赐与，他有自己的抱负。为此，他在二十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，并且荣获进士甲科。这是很不容易而又是十分光彩的事。考中进士，才可以真正做官。司马光先后被任命在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、江苏苏州等地，作判官之类的小官吏。还曾在杭州、虢州（今河南灵宝）等地闲住。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，司马池病逝。司马光将父亲安葬在夏县家乡，自己也在那里服丧。直到四年之后，他才丧满在河南重新任职。从宋代到近代，有一种看法，认为司马光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，是由于王安石是南方人，了解南方的社会

情况；司马光是北方人，只了解北方的社会情况，所以两人产生了意见分歧。这种看法是表面的、片面的。司马光虽出身于北方，但他的青少年时代，多在南方生活或做事，并且多次到过东南沿海各地。

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转折，是在他二十七岁那年。他终于被调到北宋首都东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先是担任中央政权中的评事、直讲、大理寺丞等一般职务，后来又担任了馆阁校职、同知太常礼院等职；参与了有关刑事、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。这就使他有会熟悉朝廷情况，了解北宋内部的矛盾与斗争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由于当时宰相庞籍被免职，司马光离开了首都。庞籍是司马光的知音，司马光的入朝为官，得力于庞籍的推荐。如今庞籍离京，而且希望司马光跟他一起走。司马光思虑再三，为报庞籍知遇之恩，毅然弃官与庞籍一同到了郢州（今山东东平）。司马光在那里，仅担任了郢州典学和通判。通判是考察官吏治绩优劣的苦差使。这是至和元年（1054年）。第二年，司马光又跟随庞籍调到并州（山西太原），任并州通判。

人生之路弯弯曲曲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司马光遇到了第二次转机。他再次被调入京，担任开封府推官等职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被提升为起居舍人，同知谏院。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。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，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，从内政外交，到社会道德，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。这是司马光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。现在看来，这些批评和建议，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，但他反对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，弊病丛生，证明了司马光当时既不守旧，更不顽固，而是主张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。遗憾的是，当朝皇帝宋仁宗和宋英宗对司马光的意见，大多听而不闻，不置可否。这就使司马光失望、苦恼。他终于决定力辞谏官之职，就

任龙图阁直学士。

治平四年(1067年)宋神宗即位。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，锐意改革。这就决定了北宋很快掀起了改革之风。本来，年富力强的司马光，在改革之风中可以意气风发地大干一番事业。宋神宗对司马光也十分看重，经欧阳修推荐，司马光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，成为宋神宗的顶梁之臣。宋神宗还曾想让司马光主持朝政，领导改革。然而，由于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，如何改革方面，产生了分歧与对立，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，司马光终于又一次离开朝廷，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，于熙宁三年(1070年)到永兴军(今陕西西安)任地方官去了。司马光是多么不愿意离开首都啊，他是多么希望宋朝能够振兴啊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。

熙宁四年(1071年)初夏，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公职，改判西京(今河南洛阳)留司御史台。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。从此，司马光在洛阳“独乐园”内一住就是十五年。这十五年，司马光虽然仍然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，但既不能参与朝政，也不想参与朝政，而是埋头于完成自己主编的《资治通鉴》。从离开首都到西安，再由西安到洛阳，这是司马光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转折。这转折，对司马光来讲，是祸从天降。然而又有谁不为司马光的因祸得福而敬佩呢？举世闻名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正是由于司马光可以闲居洛阳十五年，专心致志地修成了。这才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。司马光将与《资治通鉴》永存。

要不是宋神宗病死，要不是王安石变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，司马光本来会安居洛阳著书立说，直到谢世。由于宋神宗于元丰八年(1085年)去世，由于高太后坚持要让司马光出山作相，司马光才于元丰八年夏再一次入京。对司马光来讲，这人生的最后一次转

折,实在是太难了。他已经六十七岁,浑身是病。要他主持朝政,要他作宰相,确实力不从心。但是,忠诚可嘉的司马光还是接受了朝野之望。他以惊人的毅力,日夜操劳,为国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他废除了王安石新法中仅存的青苗法、免役法和保甲法。他的悲剧,在于在这最后一次的转折之中,以老年人常有的固执,不分青红皂白,一概否定了王安石变法。

元祐元年(1086年)秋,这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历史学家,与世长逝。人们深切地怀念他,万人空巷地前往送葬,争相购买他的画像。他长眠在山西夏县。今天,他的墓地已修整一新。司马光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。

主张以仁义礼信治国治民

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。他尊孔称儒,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。他主张对百姓实行仁政。所谓仁政,就是要“兴教化,修政治,养百姓,利万物”。用当代的话说,司马光的“兴教化”,也就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,改变社会风气。司马光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大事,应该抓紧抓好。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致,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为宋朝统治服务,就会发生问题,动摇统治基础。因此,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,注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。当然,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,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范畴。但是,司马光的立足点,是要对人民实行“仁政”,不主张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。他甚至认为,老百姓反抗朝廷,发生暴动,责任不在人民,而在于统治者;是各级官吏官逼民反,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。为防止百姓主要是

农民起义，司马光强调要“修政治”，即选用好人才，修改好政策法规，严明法纪等。

司马光的“养百姓”，就是要宽待百姓主要是农民，不要过分剥削农民，压迫农民。在司马光看来，农民是天下衣食的直接生产者，如果不让农民休养生息，维持简单再生产，那么，不但农民活不下去，国家也将贫穷衰亡。这种“民为贵”的民本思想，支配着司马光的行动。他一再反对当朝向农民增加税收。他极力劝谏统治者不要挥霍民财。由于灾荒，许多州县老百姓受饥挨饿，“民多菜色”，而朝廷官吏还在那里搜括百姓，挥霍浪费，他怒不可遏，坚决要求朝廷节省开支，罢宴罢赐。而他自己，则带头将恩赐交给公用。由于北宋农民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劳动太多，甚至使农民流离失所，司马光建议减轻劳役负担。有一次，司马光拍案而起，坚决要求皇帝“更下诏书，深自咎责，求所以事天养民，转灾为福之道”。也就是说，司马光要求皇帝深刻检讨，并且让大家都知道犯了什么错误；之后，再想办法如何“养民”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，以转灾为福。这种为民请命的胆量和气概，当时并不多见。

“养百姓”是前提，“利万物”是目的。所谓“利万物”，就是有利于物质生产。司马光不是清谈家或空想家，他知道要国强民富，不发展生产，不重视生产，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，是一句空话。因此，司马光同样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。他明确地说过，农业是国家的根本，而当时的一些政策法规，已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因此，他曾尖锐指出“害农者政也”，即政策阻碍了发展农业。他建议“为今之术，劝农莫如重谷，重谷莫如平糴”。在他看来，光是口头上叫喊重视农民，劝告农民好好生产，是不够的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使之能够安居乐业。所谓“平糴”，宋初叫“常平仓”，是行之有效的重农政策：在丰收年景，政府以高价大量购买粮

食，避免谷贱伤农；而在灾害兼收之年，政府则以低价将粮食卖给农民，甚至救济贫民，以免谷贵害农。这种措施，到司马光时代已经名存实亡。司马光再三主张整顿和恢复“常平仓”以促进农业生产。

从上述中心政治思想出发，司马光在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道德等各个方面，对当时的种种弊端，提出了批评。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，他任谏官和侍从时，更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革新意见。

例如，在人才问题上，司马光反对冗官成灾，因循守旧，无所事事的恶劣风气，主张精兵简政，主张打破门第出身，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，主张以实际才德，越级提拔重用各种专门人才。又如，当时冗费和冗兵惊人，成为极大祸害，他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，主张还兵于农，不要扩军，要让士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；而对于国家无度的开支，他更严厉要求上自皇帝，下至县吏，应该节约为民。再如，司马光对于当时朝廷麻木不仁，反而以歌舞升平来掩盖问题成堆的状况，十分不满，指出这是不事进取，得过且过的坏风气。他强调“务实”，要少说空话，多干实事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实事求是。而他自己，则是埋头苦干的务实家。有一次，司马光叫人去卖掉他家的马。他嘱咐卖马的，一定要讲清楚，“此马夏月有肺病”，不要欺骗别人。卖马的暗自发笑：司马光简直老实到愚蠢的地步。还有一次，他为村民讲学，村民提出一个怪问题，司马光老实承认，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不能解答；以后研究清楚了，再来回答你们。

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

反对王安石变法，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。

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，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，王安石变法之前，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与一致。当时的所谓嘉祐四友，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。俩人时常相聚交谈，以诗唱和，以文会友。从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俩人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。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，准备推行新法之初，司马光还对王安石抱有好感。有人攻击王安石时，司马光并不赞成，认为是言过其实。

那么，司马光为什么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，直到被人称为反变法派的首领呢？其原因，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“与民不利”。变法之前，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，但是，变法开始之后，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位置，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。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数倍于国初，但由于冗兵、冗费和冗官等的巨额开支，造成了国库空虚，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。宋神宗即位，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财政困难。他曾召集王安石、司马光等，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。司马光回答，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，注意节流，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，就可以省下来。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。王安石所说的理财，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。而要增加收入，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、商人、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。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。他说：天下财